

#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李 涛,罗晓梅

(重庆理工大学 会计学院 重庆 400054)

**摘要:**以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抑制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特别是收入转移;从内部治理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低、组织协调整合能力差的企业的分类转移影响更显著;从外部监督来看,当企业受媒体关注较少、被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对于核心盈余小于 0、净利润大于 0、净利润大于 0 但核心盈余小于 0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推进数字经济治理效应和提升企业盈余质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分类转移;内部治理;外部监督

**中图分类号:**F275;F27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23)06-0056-11

##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选择。根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为38.1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7.1万亿美元,占总量的18.55%。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企业开始加速数字化转型,采用信息技术推动生产、管理和服务的全面升级,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苹果公司采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沃尔玛通过数字化技术优化物流管理,实现运营成本的降低;谷歌等科技巨头则通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驱动业务创新并带来巨额收益。

现有文献聚焦于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一是在经济效益上,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并颠覆了价值创造过程<sup>[1]</sup>,进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sup>[2-3]</sup>、绩效表现<sup>[4]</sup>等,最终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sup>[5]</sup>;二是在企业治理上,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激励<sup>[6]</sup>,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进而提升企业治理水平<sup>[7]</sup>。也有学者开始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企业内部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sup>[8]</sup>,进而抑制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sup>[9-11]</sup>。已有研究<sup>[12-13]</sup>指出,不同盈余管理间存在替代效应,即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可能选择更具隐蔽性和灵活性的盈余管理策略以达到目标。那么,对于第三类盈余管理方式——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以下简称“分类转移”),数字化转型发挥治理作用还是促进作用?现有研究尚未揭示。

分类转移是指管理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错误分类,以改善核心盈余的操纵方式<sup>[14]</sup>。已有文献

收稿日期:2023-06-21;修回日期:2023-1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化背景下‘工业四基’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机制与扶持政策研究”(22BJY154)

作者简介:李涛(1980—),男,河南南阳人,管理学博士,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化转型、财务管理;罗晓梅(1998—),女,四川乐山人,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化转型、财务管理。

对分类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聚焦公司治理,如董事会治理<sup>[15]</sup>、内部控制<sup>[16]</sup>等。也有部分学者从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sup>[17]</sup>、原则导向会计准则<sup>[18]</sup>等外部环境出发,得出企业为规避外部监管会出现更多分类转移的结论。可见,不同的治理环境对企业分类转移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数字化转型这一战略变革,既有研究尚未将其和分类转移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背景下分类转移行为的动因和机制,对防范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并进一步发挥治理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现有研究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对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第三类盈余管理方式——分类转移的影响,提供了数字化转型发挥积极治理作用的增量依据,进而为进一步推动数字化转型提供证据支持。第二,为提高企业的盈余质量提供经验证据。分类转移属于盈余结构间的操纵,虽然不影响净利润,但会降低核心盈余的持续性,干扰投资者对企业业绩的正确判断。本文从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的角度,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审计师等多方主体对企业分类转移的关注度,发挥共同治理作用,进而改善盈余质量。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一) 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

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业务场景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改善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和融资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的分类转移行为。

第一,“信息效应”。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减少分类转移。核心盈余是投资者评估公司价值的主要依据,为满足投资者的积极预期,企业存在以分类转移方式虚增核心盈余的偏好<sup>[19]</sup>。数字化转型促使传统企业摆脱传统经营管理模式,推动企业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从而颠覆价值创造过程<sup>[1]</sup>,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附加值和实现了交易成本节约效应。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价值倍增效应会逐渐凸显,进而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核心盈余。根据信号理论,当企业绩效、发展前景等表现良好时,企业更乐意披露真实的盈余信息,向市场及时、充分地传递利好消息,改善投资者对企业估值表现,减少分类转移行为。另一方面,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为企业实施分类转移提供了条件,数字化转型突破了外部利益相关者难以监督企业分类转移的局限性。通常数字化转型程度越深入的企业,其信息系统越完善,越能提供便捷、成本低廉和门槛较低的信息,这不但有助于缓解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搜集劣势,而且使其借助可视化工具和机器学习算法,将结构化数据优化升级为各种图像、音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弥补了信息分析能力的有限性<sup>[20]</sup>,从而为更好地识别企业分类转移提供机会和能力。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驱动企业治理模式从单向治理向多元化治理转变,增加了企业分类转移被曝光的可能性,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可能会进一步波及企业生产运营的各环节,因而企业出于规避经营风险的考虑会谨慎进行分类转移。

第二,“资源支持效应”。在中国,企业广泛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良好的财务业绩意味着企业经济实力较强、发展前景较好以及贷款违约风险较低,是企业获取金融支持的有力筹码,使其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迎合市场以缓解融资约束。具体地,权益性融资门槛高、要求严,企业借助盈余管理有利于达到IPO、配股的苛刻条件。路军伟等<sup>[21]</sup>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IPO前三年存在显著的分类转移,将核心费用分类转移至营业外支出以虚增核心盈余;信贷融资也是如此,企业通过盈余管理调增的利润越多,获得信贷资源也就越多<sup>[22]</sup>。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通常作为硬性约束或考核条款,核心盈余逐渐成为资本市场中资金供给方的聚集点,企业通过分类转移提高核心盈余的动机也愈加强烈。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进行分类转移的动机。

具体地,在“融资难”的问题上,企业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快速地掌握资金供给方的海量信息,

使用特定技术工具对数据进行筛选与分析,能够更具针对性地披露资金供给方所需的信息,缓解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外部信息环境的改善有助于资金供给方注意和识别出市场中的“优质贷款人”,挤出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增强企业融资可得性。在“融资贵”的问题上,国家深入推进数字经济的战略支持使得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在这种认证效应下,增加了企业用较低的成本获取资金的可能性。另外,相比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处理和输出信息的能力更强,向外部推送的价值相关性信息更多,有助于投资者和债权人更充分地掌握企业的经营情况,降低其信息成本、决策成本以及面临的估值风险,进而减少投资者和债权人因环境不确定所要求的风险溢价,缓解“融资贵”的困境。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a。

假说 1a: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抑制分类转移盈余管理。

推进数字化转型需要长期的探索与试错,在实现数字技术与现有商业模式、组织结构等协同融合的过程中,企业的融资需求、业务复杂性以及盈余压力可能会增加,这为企业进行分类转移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首先,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越大,较高的融资需求会扩大资金提供方所面临的风险敞口,企业需要在原先已经较高的业绩基础上再提升业绩以降低融资风险,就会触发更多的分类转移行为<sup>[23]</sup>。一部分原因是盈余管理策略受到资本市场监督、盈余操控灵活性和处罚风险的影响,相较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分类转移不改变公司的利润总额,不需要撤销应计或减少未来现金流,不容易引起外部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注意,操纵成本相对更低<sup>[13,19,24]</sup>;另一部分原因是数字化转型越高的企业,实施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难度越高<sup>[9-11]</sup>,促使企业另辟蹊径——寻求分类转移作为替代选择。其次,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收益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企业用于数字化转型的资金可能挤占生产资源,产生较高的试错成本与机会成本<sup>[25]</sup>;转型后短期内的经济绩效增加值可能会与增加的管理成本费用相抵,致使企业整体绩效不明显甚至呈负相关,增加盈余压力<sup>[1]</sup>,企业为“避亏”“保牌”,往往会采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分类转移<sup>[26]</sup>。最后,在数字化情境下,业务流程不再受空间、时间、上下游的限制,降低了范围经济内的协作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其他领域,使得企业业务模式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会加剧内部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利益相关者的监督难度和监督成本<sup>[27]</sup>,也可能赋予管理层在划分某些费用或损失时更多的自由裁量权<sup>[11]</sup>,形成更多的分类转移。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b。

假说 1b: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分类转移盈余管理。

## (二) 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操纵方式

Mevay<sup>[14]</sup>指出,分类转移存在两种方式:将非经常性收益(租金收入、附属收入和投资收益)归类为经常性收益,即收入操纵;将经常性费用(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归类到非经常性费用,即费用操纵。

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操纵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相较于费用操纵,企业的收入操纵动机更强<sup>[28]</sup>。这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收入是判定企业规模的重要标准,直接影响公司经营和投融资活动,公司规模越大,获得的债务融资就越多;二是收入是评估企业业绩的关键指标,例如中国对公司上市的营业收入具有硬性要求;三是对投资者而言,增加营业收入比削减核心支出更有吸引力<sup>[29]</sup>;四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允许企业根据其业务性质确定营业收入和非营业收入,给予企业实施收入分类转移的“合法性”。

进一步地,数字技术可以给企业提供更多收入操纵的机会,在发现和防范收入操纵方面也更加高效。互联网使得企业涉足其他领域或跨界协作经营更加便捷,提升了公司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收入的确认上,管理层需要对复杂的业务做出充分的职业判断,给予了管理层将收入从一项业务转移到另一项业务的机会。同时,数字化技术也提高了监管机构的监督能力。例如,注册会计师可

以在未获取相关审计证据前直接假定企业收入存在舞弊,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企业的销售记录、客户关系、退款情况等进行分析和比对,从中发现异常数据以识别潜在的收入操纵行为。然而,对于费用确认,会计准则给予管理层的职业判断空间更小,使得费用操纵实施更难。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与费用操纵方式相比,数字化对收入操纵方式的分类转移影响更为显著。

###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所涉及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ST、\*ST的上市公司;(3)仅保留至少连续5年不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4)剔除年度样本量小于15的行业数据<sup>[21]</sup>;(5)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上述数据处理采用Excel和Stata 16.0软件实现,最终获得25 881个观测值。

#### (二) 变量定义

##### 1. 被解释变量(Class)

本文首先采用McVay<sup>[14]</sup>提出的通过核心盈余预测模型来估计非预期核心盈余及其变化,通过式(1)和式(2)分年度-行业回归得到(制造业为二级,其他行业均为一级):

$$CE_t = \alpha_0 + \alpha_1 CE_{t-1} + \alpha_2 ATO_t + \alpha_3 ACC_t + \alpha_4 ACC_{t-1} + \alpha_5 \Delta Sale_t + \alpha_6 Neg \times \Delta Sale_t + \varepsilon \quad (1)$$

$$\Delta CE_t = \beta_0 + \beta_1 CE_{t-1} + \beta_2 \Delta CE_{t-1} + \beta_3 ATO_t + \beta_4 ACC_t + \beta_5 ACC_{t-1} + \beta_6 \Delta Sale_t + \beta_7 Neg \times \Delta Sale_t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核心盈余(CE)为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Delta CE$ 为CE的变化值;ATO为净经营资产周转率,等于营业收入/[期初净经营资产+期末净经营资产]/2]; $\Delta ATO$ 为ATO的变化值;ACC为经期初总资产标准化的核心应计盈余,核心应计盈余等于核心盈余减去经营现金净流量; $\Delta Sale$ 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当期营业收入增长率为负时,Neg取值为1,否则为0;式(1)得到的残差为非预期核心盈余(UE\_CE),式(2)的残差为非预期核心盈余变化(UE\_ΔCE)。

其次,借鉴徐沛勳<sup>[15]</sup>的研究,构建式(3),并将回归结果的拟合值 $\times 100.0$ 作为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操纵程度(Class)。进一步地,通过构建式(4)和式(5)得到的拟合值 $\times 100.0$ 分别作为费用转移(ClassD)和收入转移(ClassI),以区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类型。其中,NBL为营业外支出与营业外收入的差,DBL表示营业外支出,IBL表示营业外收入,且均经期初总资产平滑。

$$UE\_CE_t = \theta_{01} + \theta_{10} NBL_t + \varepsilon \quad (3)$$

$$UE\_CE_t = \theta_{02} + \theta_{11} DBL_t + \varepsilon \quad (4)$$

$$UE\_CE_t = \theta_{03} + \theta_{12} IBL_t + \varepsilon \quad (5)$$

##### 2. 解释变量(Digit)

借鉴吴非等<sup>[30]</sup>的做法,首先借助上市企业年报信息配对,归集整理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数字技术应用”5个方面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分类词语,构建一个以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词典。然后基于机器学习,用Python抓取有关数字化转型的词频,并对词频总和加1后取对数,得到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

##### 3. 控制变量(Controls)

为减轻遗漏重要变量可能产生的计量检验偏误,本文借鉴已有研究<sup>[10,31]</sup>,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公司年龄、独立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董事会规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否两职合一。同时,为减轻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控制了行业和年度效应。

所有变量的定义和测量见表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分类转移	<i>Class</i>	式(3) 计算得到的拟合值 × 1 000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i>Digit</i>	Ln(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 + 1)
	公司规模	<i>Size</i>	Ln(公司期末总资产)
	公司年龄	<i>Age</i>	Ln(当前年份 - 公司成立时间 + 1)
控制变量	独立董事比例	<i>Indep</i>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管理层持股比例	<i>Msh</i>	管理层持股数/总股份
	资产负债率	<i>Lev</i>	期末总负债/总资产
	盈利能力	<i>ROE</i>	期末净利润/净资产
	成长能力	<i>Growth</i>	(当期总资产 - 上期总资产) / 上期总资产
	董事会规模	<i>Board</i>	Ln(董事会人数 + 1)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Inst</i>	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总股份
	是否两职合一	<i>Dual</i>	虚拟变量,当董事长和总理由同一个人担任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年度	<i>Year</i>	虚拟变量,年度固定效应
	行业	<i>Ind</i>	虚拟变量,行业固定效应

### (三) 模型构建

#### 1. 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存在性检验

由于操控性应计和真实活动操控与分类转移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参考已有研究<sup>[15,19,21]</sup>,通过式(3)、式(6)、式(7)、式(8)对分类转移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其中 *DA* 为应计盈余管理操纵程度, *REM* 为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程度。如果式(3)和式(6)中 *NBL* 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式(7)和式(8)中 *NBL* 的系数不显著为正,则表明样本存在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操纵行为。

$$UE\_CE_t = \theta_{04} + \theta_{13}NBL_t + \theta_{20}DA_t + \theta_{30}REM_t + \varepsilon \quad (6)$$

$$UE\_ACE_t = \theta_{05} + \theta_{14}NBL_t + \varepsilon \quad (7)$$

$$UE\_ACE_t = \theta_{06} + \theta_{15}NBL_t + \theta_{21}DA_t + \theta_{31}REM_t + \varepsilon \quad (8)$$

#### 2. 基准回归检验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效应,构建式(9):

$$Class_{i,t} = \alpha_0 + \alpha_1 Digit_{i,t} + \sum \alpha_k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9)$$

其中 *Class* 为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 *Digit*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系数  $\alpha_1$  代表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如果  $\alpha_1$  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分类转移,假说 1a 成立,反之假说 1b 成立。

### 四、实证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异常核心盈余 (*UE\\_CE*) 的最小值为 -0.5669,最大值为 0.6040,标准差为 0.0582; 分类转移程度 (*Class*) 的最小值为 -9.1251,最大值为 1.1541,标准差为 0.9324,表明不同上市公司的异常核心盈余存在较大差异且普遍存在分类转移行为。数字化转型程度 (*Digit*) 的最小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Class</i>	25 881	-2.207 9	0.932 4	-9.125 1	1.154 1
<i>UE\_CE</i>	25 881	-0.002 2	0.058 2	-0.566 9	0.604 0
<i>UE\_ACE</i>	24 251	0.078 5	0.120 4	-0.531 3	0.921 4
<i>Digit</i>	25 881	0.959 1	1.167 8	0	4.430 8
<i>Size</i>	25 881	22.287 0	1.358 6	19.191 9	26.245 6
<i>Age</i>	25 881	2.852 0	0.351 2	1.386 3	3.465 7
<i>Inst</i>	25 881	0.454 9	0.232 9	0.002 7	0.915 9
<i>Msh</i>	25 881	0.089 0	0.164 3	0	0.683 0
<i>Board</i>	25 881	2.139 6	0.200 0	1.609 4	2.708 1
<i>Indep</i>	25 881	0.374 0	0.053 7	0.300 0	0.571 4
<i>Growth</i>	25 881	0.162 5	0.380 0	-0.387 7	2.751 1
<i>Lev</i>	25 881	0.467 2	0.215 2	0.053 3	1.063 7
<i>Dual</i>	25 881	0.226 9	0.418 9	0	1
<i>ROE</i>	25 881	0.056 0	0.151 0	-0.772 0	0.420 2

值为0,最大值为4.4308,平均值为0.9591,标准差为1.1678,与吴非等<sup>[30]</sup>报告的结果相近,表明样本中大部分公司进行了数字化转型,且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

(二) 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根据既有文献,异常核心盈余及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行为<sup>[14,21]</sup>,因而本文除了将Class作为被解释变量外,还将UE\_CE、UE\_ΔCE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列(1)至列(3)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Digit)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进一步地,从分类转移的类型来看,列(4)和列(5)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收入转移的系数为-0.032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对于费用转移并不显著,说明与费用转移相比,数字化转型对收入转移的抑制作用更强,假说2得证。

表3 基准回归: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

变量	(1) UE_CE	(2) UE_ΔCE	(3) Class	(4) ClassD	(5) ClassI
Digit	-0.0014*** (-4.235)	-0.0016** (-2.404)	-0.0190*** (-3.458)	0.0118 (0.821)	-0.0324*** (-3.042)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0178** (-2.056)	0.0420** (2.409)	-4.2977*** (-29.585)	-8.3695*** (-22.132)	-8.0765*** (-28.715)
Observations	25881	24251	25881	25881	25881
R <sup>2</sup>	0.218	0.310	0.146	0.097	0.173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1)分类转移的存在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式(3)和式(6)非经常性损益(NBL)系数显著为正,式(7)和式(8)非经常性损益(NBL)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非经常性损益与本期异常核心盈余显著相关性并非源于正常的经营活动,验证了上市公司分类转移的存在性。(2)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缓解样本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在第一阶段,将上市公司同年、同行业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Mean\_digit)作为外生变量,测算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概率并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在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控制变量对式(9)进行回归。(3)将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性得分后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衡量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净效应”,缓解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等内生性问题。(4)考虑到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后的经营调整、财务风险应对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即企业的分类转移行为较数字化转型决策有一定的滞后性,将因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5)考虑到中国直辖市的特殊性,其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模式等与普通省份存在较大差异,剔除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样本<sup>①</sup>。

(四) 机制检验

1. 信息效应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分类转移。本文借鉴张嘉伟等<sup>[11]</sup>的研究,采用KV模型衡量信息披露质量:

$$\ln \left| \frac{\Delta P_t}{P_{t-1}} \right| = \alpha_0 + \alpha_1 \left( \frac{Vol_t}{Vol_0} - 1 \right) + \varepsilon_{it} \quad (10)$$

①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

其中  $P_{t-1}$  为第  $t-1$  日的收盘价  $\Delta P_t$  为  $P_t$  与  $P_{t-1}$  的差,  $Vol_t$  和  $Vol_0$  分别为第  $t$  日交易量和观测期内所有交易日的平均交易量。将式(10)中的系数  $\alpha_1 \times 10^6$  求得  $KV$  指数,该值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差。根据中介效应三步法,对“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分类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第(1)列中数字化转型( $Digit$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列(2)显示,中介变量信息披露质量( $KV$ )的系数为0.1974,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信息披露质量发挥了中介作用。

## 2. 资源支持效应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分类转移动机。本文借鉴顾雷雷等<sup>[32]</sup>的研究,以  $FC$  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该值越高,表明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

表4中列(3)至列(4)展示了“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分类转移”影响路径的回归结果。其中,列(3)中数字化转型( $Digit$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列(4)显示,融资约束( $FC$ )的系数为0.0801,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融资约束也发挥着中介作用。

## 五、进一步分析

### (一) 内部治理异质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分类转移是一种关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委托代理问题,尤其是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如出于薪酬契约动机将非经常性损益转移到经常性损益以实现核心盈余增长目标。根据管理控制论,数字技术的使用有助于重构信息流,减少人为控制失效导致的主观操纵风险。本文采用迪博风险数据库中的内部控制指数衡量内部控制质量<sup>[33]</sup>,并根据其是否高于企业所处行业中值,将样本分为内部控制质量高和内部控制质量低两组。回归结果如表5中列(1)和列(2)所示,无论内部控制质量高低,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从系数上来看,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数字化转型( $Digit$ )系数的绝对值更高,且组间系数检验显著,表明数字化的治理作用相对更强。

组织协调整合能力对于企业成功实施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根据

表4 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机制检验

变量	机制1:信息效应		机制2:资源支持效应	
	(1) $KV$	(2) $Class$	(3) $FC$	(4) $Class$
$Digit$	-0.0055*** (-9.390)	-0.0175*** (-3.251)	-0.0042*** (-4.829)	-0.0195*** (-4.152)
$KV$		0.1974*** (3.445)		
$FC$				0.0801** (2.28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7330*** (47.406)	-4.1461*** (-27.999)	3.9352*** (169.149)	-3.6227*** (-19.308)
Observations	25735	25735	24312	24312
R <sup>2</sup>	0.298	0.143	0.769	0.141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表5 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内部治理异质性

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		组织协调整合能力	
	(1) 低	(2) 高	(3) 低	(4) 高
$Digit$	-0.0222** (-2.143)	-0.0157*** (-3.030)	-0.0266*** (-3.509)	-0.0113 (-1.41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5.5372*** (-22.217)	-2.9648*** (-19.833)	-4.1941*** (-20.202)	-4.3155*** (-20.933)
$P$ -value	0.082*		0.000***	
Observations	12803	13078	12940	12941
R <sup>2</sup>	0.150	0.143	0.143	0.156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经验  $P$  值为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体抽样(Bootstrap)500次得到。

动态能力理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是组织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如果企业受到组织惯性、组织学习能力等的制约,转型的“阵痛期”将进一步被放大。因而,组织协调整合能力低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和意愿更低。加之其内部管理效能有限,使得更多的分类转移行为成为可能,更容易受到数字化转型的冲击。借鉴张昊和刘德佳<sup>[34]</sup>的研究,以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企业协调整合能力的代理变量,其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协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整合内部资源的能力越强。在此基础上,根据总资产周转率是否高于企业所处行业中值,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回归结果如表5中第(3)列和第(4)列所示, *Digit* 的系数在组织协调整合能力低的组中更显著,表明当企业组织协调整合能力更低时,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抑制作用更强。

## (二) 外部治理异质性

媒体关注度不同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技术具有高通用与渗透性特征,会加剧信息扩散的“链式反应”和“蝴蝶效应”,使得盈余操纵事件能够在短时间内被无限放大,产生巨大的网络舆论压力<sup>[35]</sup>,倒逼企业减少分类转移行为。参考王福胜等<sup>[36]</sup>的研究,本文以网络媒体报道的总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衡量媒体关注度(*Media*),其数值越高,表明媒体关注度越高,信息环境相对越透明。表6中列(1)和列(2)表明,媒体关注低的企业,其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抑制作用显著,此效应不影响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可能的解释是媒体关注度越高的企业,其承担的市场压力和违规成本越高,实施分类转移的可能性越小。相反,在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由于市场监督更弱,导致其分类转移动机更强,因而数字化转型会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

审计质量不同的企业,其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作用存在差异。本文将是否接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对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的差异进行检验。表6中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 *Digit* 的系数在被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显著为负,而对于被“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不显著。这是因为: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基数较大,面临的法律风

表6 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外部监督异质性

变量	媒体关注		是否接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 低	(2) 高	(3) 否	(4) 是
<i>Digit</i>	-0.0333*** (-4.056)	-0.0044 (-0.602)	-0.0199*** (-3.480)	-0.0227 (-1.227)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4.9718*** (-19.420)	-3.9006*** (-21.157)	-4.5844*** (-29.077)	-3.4537*** (-7.413)
<i>P-value</i>	0.000***		0.022**	
<i>Observations</i>	12559	13322	24305	1576
<i>R<sup>2</sup></i>	0.151	0.156	0.148	0.163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经验*P*值为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体抽样(Bootstrap)500次得到。

险、声誉风险和监管风险较高,他们往往会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不会纵容分类转移行为<sup>[37]</sup>。而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涉及业务范围广,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涉足更深,对于隐蔽的盈余管理活动更易发挥专长,识别分类转移<sup>[38]</sup>。因此,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数字化转型对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因而对分类转移的抑制作用也更强。

## (三) 企业盈利情况异质性

从操纵动机来看,核心盈余是投资者和分析师评价企业业绩的重要指标,企业有动机为满足其预期进行分类转移,特别是核心盈余小于0的企业<sup>[39]</sup>。本文根据“核心盈余是否小于0”,对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如表7中列(1)和列(2)所示,数字化转型对核心盈余小于0的企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这一效果对核心盈余大于0的企业却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核心盈余小于0”不仅难以满足投资者预期,同时还可能受到信用评级和融资等限制,操纵动机更强,在数字化情境下,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得以有效缓解,有助于及时发现这一行为。



从操纵收益来看,盈利企业更可能进行分类转移。高雨和闫绪奇<sup>[40]</sup>指出,亏损企业分类转移不易达到较为满意的盈余管理目标,可实现“收益”较小;而盈利企业通常面临满足上市、再融资要求,或者避免公司业绩出现大幅波动等情况,操纵核心盈余的收益更高。本文根据净利润是否亏损,将样本分成盈利组和亏损组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如表7中列(3)和列(4)所示。在盈利组中, *Digit*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在亏损企业中却不显著。可见,数字化转型对盈利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

进一步地,当净利润大于0但核心盈余小于0时,即非经常性损益为正,企业更具备利用分类转移调增核心盈余的动机和能力。本文根据核心盈余和净利润是否小于0,将样本分为了企业盈利且核心盈余小于0、其他情况两组,分别对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的影响效果进行检验,结果如表7中列(5)和列(6)所示。可见,当企业处于盈利且核心盈余小于0时,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抑制作用更强,而对于其他情况则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管理效率,减少企业的分类转移行为。

表7 数字化转型与分类转移:企业盈利情况异质性

变量	核心盈余		是否亏损		是否亏损 & 核心盈余	
	(1) >0	(2) <0	(3) 否	(4) 是	(5) 盈利 & 核心盈余<0	(6) 其他情况
<i>Digit</i>	-0.0042 (-0.458)	-0.0194*** (-3.035)	-0.0204*** (-4.160)	-0.0188 (-0.644)	-0.0224*** (-3.930)	-0.0073 (-0.570)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2.5425*** (-10.228)	-4.5374*** (-26.915)	-3.7393*** (-28.363)	-5.0571*** (-6.704)	-3.9831*** (-26.014)	-4.4433*** (-13.559)
<i>P_value</i>	0.000***		0.202		0.024**	
<i>Observations</i>	4834	21047	22967	2914	18230	7651
<i>R<sup>2</sup></i>	0.208	0.145	0.150	0.207	0.146	0.167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经验*P*值为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体抽样(Bootstrap)500次得到。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分类转移,尤其是收入转移;(2)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分类转移的影响路径;(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外治理差异上,当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低、组织协调整合能力差、媒体关注度低、被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影响更显著;在盈利情况异质性上,当核心盈余小于0、净利润和非经常性损益大于0时,数字化转型对分类转移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对于企业来说,需积极进行合理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治理能力。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要注意与现有组织管理理念的融合,减少组织摩擦和惯性,提高协调整合能力,缩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阵痛期”。在应用数字技术时,一是可以建立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尤其是在收入确认的管理上,实时监控和反馈管理层利用职权优势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不当行为,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压缩管理层将营业外收入转移计入营业收入的空间;二是为管理层提供科学决策机制,改善投资效率,缓解盈余压力,抑制管理层操纵核心盈余的动机;三是建立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企业信息的互联互通,主动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及时向市场传递真实准确的盈余信息,成为市场中的“优质贷款人”,缓解融资困境,为创造企业价值持续赋能。(2)对投资者和监管部门而言,一是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信息不对称是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重要原因,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可以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克服接收的劣势,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将结构化数据优化升级为各种图像、音频等非结构化数据,缓解自身分析能力的有限性。二是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等外

部治理作用,借助专业人士、媒体提供的研究报告等,多渠道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更好地甄别企业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共同治理的作用。三是特别关注分类转移频发企业。例如,媒体关注低、被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受到监督压力较轻,可能表现出更强的操纵动机和更多的操纵空间,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应当注意甄别其可能存在的盈余操纵风险。尤其是常常容易忽略的盈利企业,其可能为避免盈余起伏波动、满足上市等监管条件而进行分类转移操纵,因此,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同样应当关注盈利企业的操纵迹象。另外,加强对企业收入操纵行为的警惕性,防范企业借助数字技术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盈余操纵的风险。

#### 参考文献:

- [1] 戚聿东, 蔡呈伟.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多重影响及其机理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20(7): 108 - 119.
- [2] 赵宸宇, 王文春, 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经济, 2021, 42(7): 114 - 129.
- [3] 杨向阳, 李月月, 徐从才. 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3(3): 5 - 21.
- [4] 陈旭, 江瑶, 熊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 2023(2): 112 - 120.
- [5] 王博, 康琦.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J]. 经济管理, 2023, 45(6): 161 - 176.
- [6] 陈德球, 张雯宇.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J]. 经济管理, 2023, 45(5): 132 - 150.
- [7] 祁怀锦, 曹修琴, 刘艳霞. 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J]. 改革, 2020(4): 50 - 64.
- [8] GOLDFARB A, 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1): 3 - 43.
- [9] 倪国爱, 江寅炜.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J].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22, 38(3): 37 - 43.
- [10] 罗进辉, 巫奕龙. 数字化运营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J]. 管理科学, 2021, 34(4): 3 - 18.
- [11] 张嘉伟, 胡丹丹, 周磊.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 ——来自真实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22, 44(1): 122 - 139.
- [12] COHEN D A, DEY A, LYS T Z. 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and Post-Sarbanes-Oxley periods[J].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3): 757 - 787.
- [13] DECHOW P, GE W, SCHRAND C. Understanding earnings quality: a review of the proxies, their determina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2-3): 344 - 401.
- [14] MCVAY S E.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an examination of core earnings and special items[J]. Accounting review, 2006, 81(3): 501 - 531.
- [15] 徐沛勳. 高管薪酬、董事会治理与分类转移[J]. 财贸经济, 2020, 41(3): 80 - 99.
- [16] 傅绍正. 高管权力、内部控制与国企费用归类操纵[J]. 管理评论, 2021, 33(1): 269 - 277.
- [17] 常正伟, 王海林.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对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11): 32 - 39 + 3.
- [18] 周嘉南, 宋菲, 罗顺根. 原则导向会计准则与公司分类转移盈余管理[J]. 管理科学, 2022, 35(6): 113 - 128.
- [19] 李晓溪, 刘静, 王克敏. 公开增发公司分类转移与核心盈余异象研究[J]. 会计研究, 2015(7): 26 - 33 + 96.
- [20] WARREN J D, MOFFITT K C, BYRNES P. How big data will change accounting[J]. Accounting horizons, 2015, 29(2): 20 - 59.
- [21] 路军伟, 张珂, 于小偶. 上市公司 IPO 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来自我国 A 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19(8): 25 - 31.
- [22] 马永强, 赖黎, 曾建光. 盈余管理方式与信贷资源配置[J]. 会计研究, 2014(12): 39 - 45 + 95.
- [23] 卢太平, 张东旭. 融资需求、融资约束与盈余管理[J]. 会计研究, 2014(1): 35 - 41 + 94.
- [24] FAN Y, BARUA A, CREADY W M, et al. Managing earnings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evidence from quarterly special items[J].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4): 1303 - 1323.
- [25] 刘政, 姚雨秀, 张国胜, 等. 企业数字化、专用知识与组织授权[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9): 156 - 174.

- [26] BRADSHAW M T , SLOAN R G. GAAP versus the stree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wo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earning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 2002 , 40( 1) : 41 - 66.
- [27] 史亚雅 杨德明. 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与盈余管理 [J]. *科研管理* 2021( 4) : 170 - 179.
- [28] BANSAL M , KUMAR A , BHATTACHARYYA A , et al. Predictors of revenue shifting and expense shifting: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 economics* , 2023 , 19( 1) : 1 - 28.
- [29] MALIKOV K , MANSON S , COAKLEY J.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of revenues [J].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 2018 , 50( 3) : 291 - 305.
- [30] 吴非 胡慧芷 林慧妍 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 [J]. *管理世界* 2021 , 37( 7) : 130 - 144 + 10.
- [31] 程富 王福胜. 基于分类转移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财经研究* 2015 41( 7) : 81 - 94.
- [32] 顾雷雷 郭建鸾 王鸿宇.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J]. *金融研究* 2020( 2) : 109 - 127.
- [33] 杨旭东 彭晨宸 姚爱琳. 管理层能力、内部控制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J]. *审计研究* 2018( 3) : 121 - 128.
- [34] 张昊 刘德佳. 数字化发展对先进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 [J]. *中国软科学* , 2023( 3) : 150 - 161.
- [35] 朱孟楠 梁裕珩 吴增明. 互联网信息交互网络与股价崩盘风险: 舆论监督还是非理性传染.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 10) : 81 - 99.
- [36] 王福胜 王也 刘仕煜. 网络媒体报道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投资者异常关注视角的考察 [J]. *南开管理评论* 2021 24( 5) : 116 - 129.
- [37] DEFOND M , ZHANG J Y. A review of archival auditing research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 2014 , 58 ( 2 - 3) : 275 - 326.
- [38] 林永坚 王志强. 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财经研究* 2013 39 ( 6) : 73 - 83.
- [39] 黄亮华 谢德仁. IPO 前的业绩压力、现金流约束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 , 17( 6) : 72 - 82 + 138.
- [40] 高雨 闫绪奇. 上市公司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研究——基于政策监管视角 [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4 28( 1) : 32 - 42.
- (责任编辑:王顺善;英文校对:谈书墨)

##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LI Tao , LUO Xiaomei

( School of Accounting ,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Chongqing 400054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tudi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arnings management of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degre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by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 especially revenue manipulation. From an inter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of enterprises with low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poor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 wh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supervision , when enterprises receive less media attention and are audited by non-Big Four companies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In enterprises with negative core and earnings , positive net profits and both presence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play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role. Our conclusions provide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earning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internal governance; external supervision